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领导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的历史实践探析

陈磊

西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泸州 646000

DOI: 10.12238/jief.v7i4.13675

[摘要] 中央苏区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大的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创的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理念和历史实践, 开创了人民医疗卫生事业的先河。在根据地军民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的历史实践与革命进程中, 所开创的党领导一切、人民至上、群众路线、团结中西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等先进的工作原则, 在健康中国行动的今天, 依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中央苏区 中共 预防医学 历史实践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leadership in popularizing preventive medicine education during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eriod

Chen Lei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646000

[Abstract]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as the largest base area during the Land Revolution Wa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itiated the concept of mass preventive medicine education and its historical practices in this region, pioneering the people's healthcare system. Throughout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mass preventive medicine education among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s in the base area, advanced principles such as Party leadership, people-first, the mass line,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prevention-focused,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have remained relevant and continue to guide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today.

[Key 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 CPC, preventive medicine, historical practice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战争阶段, 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地区开展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经常遇到缺医少药、医疗卫生人才和物资匮乏的境遇。为了坚持长期斗争, 保证军民身体健康,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 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 探索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中西医并重”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指引下, 中央苏区开展了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 促进广大军民掌握了流行病、传染病、地方病的防治知识, 提高了卫生习惯、健康水平和部队战斗力,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品格和人民至上的公仆本色。中央苏区开展的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的历史实践, 在健康中国行动开展的当下, 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一、中央苏区早期的预防医学大众化尝试

土地革命年代, 健康的身体是革命、战斗的前提, 也是保

持战斗力的重要前提。中央苏区建立之前, 一直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阶段。在这一时段, 根据地军民受赣南、闽西地形和气候的影响, 流行性疾病、传染病发生率比较高。同时这一地区长期处于偏远地带, 群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对预防医学毫不知情, 卫生和健康习惯也尚未形成。在这样一种环境下, 战斗部队除了要与看的见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斗争, 还要与看不见的病毒和疾病展开斗争。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早期阶段, 对卫生防疫、疾病预防、健康保健的工作没有高度重视。随着战斗形势的发展, 才逐渐认识到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对提升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作用。1929年2月, 红四军抵达江西省吉安县东南的东固山进行为期一周的短暂休整。在休整期间, 部队开展卫生防疫、预防疾病、健康保健知识的大众化教育。比如: 要求全体人员进行洗澡、洗衣服、抓虱子、烫虱子、治疗冻疮、脚伤、被褥消毒等预防举措。这是红四军建军以来第一次全员、

大规模的、有组织、有领导的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帮助广大官兵树立了卫生意识和预防思维。除此之外,毛泽东同志还专门为部队规定了“六项注意”,提出部队要带头讲卫生。随着斗争实践的需要,在部队中建立了“卫生制度”,涵盖个人卫生、行军卫生、驻军卫生的要求。早期的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主要在军队中开展,采取主观符合客观的工作原则,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预防医学举措。如:在行军卫生方面,要求部队准备好草鞋防止脚部磨损、打泡;绑腿要坚持适度原则,不伤肌肉;水壶的水必须装满开水,严禁喝生冷不洁之水;休息时以班排为单位挖厕所,撤离时要进行掩埋;出现病人时派专人照顾,代背枪械、物资;抵达宿营地时,由卫生人员安排连队用热水洗脚,治疗伤病员,开展“倒脚活动”,把下肢垫高,促进血液循环;连长、指导员、卫生员查铺,确保睡眠时间;撤离时打扫好卫生,归还借用的门板和稻草。驻军卫生方面,要求营地 50 米内无垃圾,道路平整,墙上用石灰水写上讲卫生为内容的标语;蹲坑厕所要用盖子盖起,便后用石灰或者干土掩埋,防臭防蝇,厕所的位置远离厨房和水源,便后洗手;保护驻地环境卫生,保护饮用水源,不吃变质食物防止中毒;驻地出现传染病人,要马上进行隔离,留下卫生员进行治疗,防止大规模传染;个人卫生方面,要求全体人员洗澡清洁、洗衣服、剪指甲、理发、晾晒被褥等,空余时间进行连排为单位的“卫生课讲授”,讲述卫生要求,提高卫生意识和预防技巧。在这些具体制度的规范下,部队全体人员身体力行,模范带头,确保了部队健康和战斗力提升。

二、前三次反围剿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举措

国民党反动派前后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围剿,由于党内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在第一次反围剿至长征开始之前,随着战争形势的压迫和苏区经济形势的紧张,开展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迫在眉睫。

从 1930 年 2 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中央苏区开展围剿战争,连续的战争使中央苏区内疾病流行。据 1932 年 1 月 13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记载,“因战争剧烈,死人也就很多,天天东逃西窜卫生全不讲究,致病死的不知几多。军阀就把病死尸体埋在农民房子里,腐烂起来,最容易发生瘟疫。富田一带,传染病非常厉害,甚至一天死 60 人左右,受传染的人发寒热,抽筋,吐泻,不到一两天,厉害的不到几个钟点,就把生命送掉,这种恐怖的传染瘟疫非常危险……”。根据这样的险情,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次专门会议专门研究“防疫问题”,决定发动群众力量,将公共卫生和群众性预防医学教育提升至急需解决事项上来。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的决策部署,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发表《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指出开展这一运动的意义和具体办法。如:瘟疫问题严重危害工农群众健康和生命,进而影响阶级战争的力量损

失,这是应该严重注意的问题,应该立即解决。爆发瘟疫的原因主要是“饮食和居住环境不卫生,传染来的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防疫的具体办法:每地每日举行一次卫生运动,发动群众,打扫卫生;凡是不洁净的脏东西,就地焚毁,清洗臭水沟;污秽之地用石灰水泼洒;腐烂的东西不吃;战争掩埋尸体的地方,土加厚,放过死尸的地方石灰水清洗;发现瘟疫的地方,病人吃过用过的东西不共用,将病人送往附近医院救治。这篇社论要求各级政府和红军应当领导群众开展防疫工作,红军的军医努力研制药剂和防疫方法,努力向群众进行宣传,指导各地的防疫运动。项英的这篇社论,是中央苏区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的重要文献,系统阐释了预防医学的目的和方法,提出了具体方法和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在中央苏区内部迅速开展了防疫的群众性运动。1932 年 2 月,《红色中华》又发表了《我们要怎样来预防瘟疫》的社论,具体的讲述了公共卫生、痘疮预防、饮食卫生、居住卫生、衣物和死亡尸体等方面的举措。1932 年 3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发布第二号训令,将卫生防疫工作列入加强和巩固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在宣传的手段和阵地上,临时中央政府创办《健康报》、《红色为卫生》,经常发表预防医学类文章和讲话。同时还编辑《卫生讲话》的通俗性读本,以广大指战员为对象,发放到连队上开展卫生课程的学习,是结合战争实际发明创造的活教材。专门针对疟疾、痢疾、疥疮、下腿溃疡四种多发病开展预防教学。红军军医学校还专门编写了《四种病》一书,专门发给基层卫生员学习,着重预防四种疾病。同时还就地取材,发挥中医中药的价值,使用常山、柴胡等中药,防治疟疾。

三、第四次反围剿至长征之前的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举措

由于战争的频率和规模都日趋扩大,伤病员的数量依然很多,伤病员的发病率也较高。如 1932 年 8、9 月间,五军团患病人数为 1757 人,占该军团减员总数的 43%。烂脚和下腿溃疡的病患,占减员总数 50%,严重削弱了部队战斗力。面对这一难题,中央军委 1932 年 9 月召开了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卫生会议,群策群力研究预防疾病的问题。经过讨论,通过了《卫生决议案》。主要涵盖普通卫生、预防方法、卫生宣传的内容和举措。这次颁布的《卫生决议案》是部队开展卫生防疫的重要文献,对后续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在个人卫生、卫生防疫、卫生宣传和卫生管理等方面积累了大量优秀经验,在当今依然熠熠生辉。如:医院卫生的管理方面,对病房卫生、病人衣物、病人粪便、尸体掩埋等都做了具体要求,具有较强的重点防控意识;卫生宣传方面,创新宣传模式,除了常规板报、壁报、墙报形式外,增加了演讲、卫生节目、舞台剧、表扬卫生先进、开展卫生知识竞赛等新形式,提高了学习效果。1932 年 10 月,中央开展“开展卫生运动”训令,全力消灭痢疾、疟疾、下腿溃疡等疾病。为了检测成果,红军领导经常下部队进行巡回视察,推动此项工作的开展。在上下联

动、官兵一致的努力下,部队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战士健康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时总结经验,于1933年2月发表《加紧防疫卫生运动》的社论。要求全员参与,全员监督,形成对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社会督促。同时组织检查卫生和清洁的突击队,经常去检查各机关驻地 and 群众家里的卫生,形成正向督促和效果检测。为了进一步巩固成果,1933年3月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内务部颁布了《卫生运动纲要》,主要涵盖国民党统治下的污秽与疾病、苏维埃政权下的卫生运动、卫生运动是广大群众的、群众应该怎么样讲卫生、怎样做卫生运动。这一政令提出了落实群众卫生运动的举措,要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达到“群众了解,高兴自己动手,无强迫和命令”的效果。根据《卫生运动纲要》的精神,临时中央政府构建了乡、区、市、县四级卫生组织领导机构,开展卫生教育、培训医护人员、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公共医药卫生事业。通过开办夜校、小学、识字班、俱乐部、墙报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宣传和普及疾病发生的根源和预防、治疗的方法,公共卫生运动日从每月一次增加到每月两到三次。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把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的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颇为重视。在会议期间,中央政府内务部管理局和中革军委总卫生部以文件形式赠送给代表每人一册《卫生常识》,该书列举了苏区最普遍的不卫生现象及目前要解决的卫生工作20条。其中包含疫苗的免费接种、种痘预防天花、疟疾预防、痢疾预防、改变封建迷信治病方法等。为了便于统一管理和调度,1934年3月将卫生运动委员会改为“中央防疫委员会”,组织领导卫生防疫工作。不久后,由于受到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央苏区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央苏区根据地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作的关于预防医学教育的努力随着战场的硝烟而暂停了,中央苏区的群众再一次陷入流行疾病、传染病、地方病包围的旧环境之中。国民党反对派在此地毫无医疗卫生资源调配以及公共卫生资源的覆盖,更谈不上开展不知己病治未病的“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的社会实践了。

四、特点总结与价值探析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根据地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在军队系统和根据地系统内开展军民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工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情感和阶级属性,那就是人民性。在缺医少药、卫生资源匮乏、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开展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治未病的保健理念,非常符合当时军民面临的实际状况。不准丢下一个伤病员、根据地军民免费接种疫苗抗击天花、红军医院免费为群众看病、医疗卫生工作也具有政治属性、俘虏兵也给医治等一些名言警句,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政治品格。

面临赣南、闽西地域缺医少药,气候潮湿的现状,中国共

产党因地制宜,举措灵活,将中医和中药纳入预防医学和健康保健的使用范围。西药不够,中药来凑。“中西医并重”的医疗卫生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在当代依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中央苏区开展的防疫运动,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唯物史观,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通过军队的卫生垂范,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取得了较大成绩。在医学教育领域,中国共产党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丢下一个伤病员,视伤病员为阶级兄妹。在卫生人才的培养上,注重政治属性,培育执行革命战斗任务的红色军医。在卫生防疫知识的宣传上,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群众路线的政治优势,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手段,让根据地军民掌握预防医学知识和卫生防疫技巧,改造生活习惯,培育卫生新风尚。创新宣传形式,如舞台剧,节目表演、歌曲小调、知识竞赛等,既拉近了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又巧妙的寓教于乐,效果显著,确保了根据地军民的身体健康。

中央苏区根据地虽然存在的历史不长,但作为中国共产党率先开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试验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中央苏区根据地开展的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和灵活机动的理论素养。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健康观、列宁社会医学理念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实际相结合,善于将预防医学提升至战略高度,通过主观符合客观,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为中国革命事业开创了正确的医疗卫生路线和方针的保障。探寻中央苏区预防医学大众化教育的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对当下健康中国行动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4]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陈毅主编:《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余伯流:《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7]张汝光编著:《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8]高恩显著:《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简介:陈磊,山东枣庄人,西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